第一章　冒险者没有乐园

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是从‘违法’开始的。

——温州人士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南海派员三下温州

如果要问，在 20世纪 70 年代末狂飙突起于中国大地的前无古人的改革风潮中，哪个地方、哪个城市最为引人瞩目，那么,除了深圳,大概就是温州了。

许多人听说温州、了解温州，往往源于此起彼伏、或明或暗的一声声疑问甚至质问：

——温州眼花缭乱的变革‘ 姓资 ’还是‘ 姓社 ”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方向 ？

——温州会把中国引向何方 ？是充满阳光和生机的绿草地，还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

——温州发生的一切究竟是中国的一种偶然还是规律性的必然 ？

差不多整整 20年，温州始终在疑问和质问中成长，浓重的阴云一直缭绕在温州人身边，挥之不去。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一次次的“ 翻烧饼 ”令他们多少感到了厌倦、麻木。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疑问也罢,质问也罢,能当饭吃吗 ？对温州人来说，什么都挡不住他们创造富裕家园的坚定脚步。

然而也有例外。1989 年前后,中南海派员三下温州。历史的这一页虽已成云烟，但温州人对此刻骨铭心。

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1994 年 2月整理的一份内部资料，对中南海派员三下温州作了详尽如实的记录。在此，我们不妨和温州人一起回眸这一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镜

头——

一下温州

时间：1989 年 8 月。

缘由：1989 年 4 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石油化工厅一位工程师提出一个提案（第 0484 号），主要内容是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其优点为城乡工商业有所发展，但资本主义影响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造成人民间贫富悬殊，致富者多靠投机倒把，建议中央会同省市组织调研人员前往总结经验教训。

过程：全国政协将这个提案转给国家体改委。4 月 30 日，国家体改委决定于 5 月 24 日派员到杭州，并于 26 日去温州。但由于 5 月北京正处在动乱中“六四”之后，国家体改委将此提案转给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同志。从 8 月 26 日至 31 日，国务院研究室武树帜局长一行 4 人受袁木指派，在温州考察了桥头、金乡、龙港、柳市等地的专业市场，与一些私营、股份合作企业主直接交谈。

那是共和国历史上令人揪心的一段岁月。躁动、摇摆、迷茫、彷徨，风云变幻，流言四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军团最先锋的另类，温州被推到了炽热的聚光灯下。

今夜有暴风雪。从各级党报日趋严厉的字里行间，从市县官员越来越凝重的神情中，温州人强烈地预感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不感到焦虑。

1989 年夏，我们第二次到老丁的皮鞋厂采访。所谓“厂”，其实小得可怜，底层加二楼不过 100 多平方米，雇了 8 名员

工。三楼就是老丁一家的生活区了。在温州数以千计的皮鞋企业中,老丁的厂属于谁都不会注意到的‘小鱼小虾”。

老丁依然两眼放光地向我们介绍他新生产的皮鞋款式如何新颖，市场上如何走俏。

“最近怎么样?外面这么乱,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我们问。

老丁愣了好一会,眼神变得黯淡:“岂止是最近有难处,其实这些年，我们温州人内心很苦，有些牢骚憋了很久。可以这么说,温州人吃的是杂草,挤出的是牛奶,听的是骂声,挨的是鞭子。

“此话怎讲？吃杂草，主要是国家计划内的东西温州基本上轮不到。发展温州经济，得自己找米下锅。没有计划内的粮草，就到荒山野岭找杂草吃，或高价从外地进。

“挤牛奶，这最明显了。温州对国家的贡献不小。前几天的《温州日报》上说,仅‘七五’这几年就上缴 9.52 亿元,而解放 30 年来国家给温州的固定资产总投资不过 6 亿元,温州交通这么不方便，铁路建设也要自己去找门路。想想看，几百万人靠这么点土地怎么生活，怎么富起来呢？多可怜的温州！

“听骂声、挨鞭子,这话说起来就多了。温州人在国家投入这么少的情况下，靠政策好，凭着自己的勤劳智慧艰苦创业。在温州像我这样有几个钱的有多少？有几个不是自己干出来的?可是这些年总有人谈‘温’色变,把温州的一切与资本主义挂钩。似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定律’:温州=资本主义,支持温州=支持资本主义,反之,批判温州=批判资本主义，表明革命立场坚定。在全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温州误解太深，我们担心一有风浪，温州又难免要‘挨鞭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究竟谁能为温州说句公道话?”告别时,老丁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久久不放。

这不仅仅是老丁的天问。多少年了,温州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不偷,二不抢,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富了自己,富了国家,这究竟有什么错?

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各地相比,温州最扎眼的现象之一就是一批人富起来了,而且富得肆无忌惮。历经几千年无休止的战乱、腐败和封闭,亿万中国百姓已经穷怕了,穷得麻木了。虽然他们心中致富的渴望从未真正泯灭,但是当一些人突然神话般地先富了起来——甚至就是在自己的身边迅速地发财致富,他们顿时感到了手足无措。社会的上上下下出现了集体意识的狐疑和不信任:这些人是谁,他们凭什么富裕,他们想干什么?

温州先富起来的主体是个体、私营企业主,顺理成章地,他们也就成为中南海调查组关注的主要对象。应第一次调查组的要求,温州市体改委的负责人宋文光和马津龙曾专门撰写了一份题为《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的参考材料,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

一、这个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阶层主要包括三类人。

第一类是私营企业中雇工较多的企业主。1988年,温州共有个体工业企业15万户,私营工业企业1万家,个体、私营商业网点75139个。

第二类是购销员中的高收入者。温州的私人购销员是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的经纪人。1984年时,温州就涌现了10万家庭企业的10万购销员,他们的收入来自按一定比例提取的购销合同业务费。

第三类是建筑工程队的经营者即包工头。温州小城镇建设突飞猛进，建制镇从 1978 年的 18 个，发展到 1988 年的 111 个。这些都为建筑包工头开辟了发财致富的门路。根据 1985 年对 40 户所谓“经营大户”的调查，其中建筑包工头的平均年收入为 6 万元。

二、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素质相对较高。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首先进入的非农业领域是家庭工业和购销业。家庭工业开始时很少有技术复杂的，一般农民都容易经营，但购销业对人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购销员往往是农民中文化水平较高，有经营头脑和见过世面的人。根据 1985 年对 147 名购销员的调查，年龄在 20—40 岁的占 70.75%。在 147 人中，共产党员有 31 人，占 21.03%；共青团员有 11 人，占 7.48%；复退军人有 19 人，占 12.93%；村干部有 20 人，占 13.61%；民办教师有 3 人，占 2.04%。还有一人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最初经营私营企业的，相当部分就来自购销员中积累了必要的原始资本的人。根据 1985 年对 31 家雇工大户的调查，除了购销员外，企业主还来自社队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原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以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边回乡青年。

因此，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并非由素质相对较低的某些特殊身份的社会成员，比如被一些人嗤之以鼻的乡间混混、刑满释放人员所组成，基本上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力资本的扭曲导向”。特别是在农村，毋宁说首先是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开放。

三、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态度在主流上是健康、积极的。

正是因为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其艰难的成功，在温州群众中确立了能够获得应有尊重的社会地位，多数人不再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和自暴自弃的行为。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除了科技协会、信息协会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组织遍布城乡外，有些地方还有比较健全的党、团和民兵组织。根据 1989 年对全市 88 家民营企业(私营、股份合作企业)的问卷调查，在回答“希望加入何种组织”时，36.4% 的人表示希望加入共产党。在温州，不少个体、私营企业主还当选为各级人大、政协的代表，被评为县、市、省和全国劳动模范。1989 年温州市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 8 人中，个体、私营企业主就有 4 人。

这篇长长的参考材料的结束语就像一场“缺席审判”的辩护词，结论明确而且慷慨激昂：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政治地位，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处境都与改革息息相关。在经济上，他们没有其他某些阶层对改革中利益变动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在政治上，改革正日益消除着人们对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身份歧视心理，使他们逐步获得了事实上平等的社会地位。对他们来说，十年改革的确是一次恩泽无量的解放，他们过去是将来也必将是中国改革最坚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1989 年 4—6 月，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中，始终没有发现有人参加支持那场风波的游行之类的活动。温州高等院校不多，只有温州大学、温州师范学院等几所。当部分学生到市区环城东路小商品市场募捐时，122 个摊位竟然个个“一毛不拔”。

6 月 5 日，北京平息动乱的第二天，各地的“示威”活动不

断，但温州市区松台街道个体劳动者协会即致电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表示拥护平乱行动。

中央电视台播放战士崔国政身亡情况后，市区妙果寺市场和永嘉县桥头镇的个体户分别给该战士家属汇款 1100 元及 2000 元。据统计，全市个体、私营企业主共向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与身亡战士家属汇款达五六万元。

一份官方的统计材料为这一至今在不少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现象做出了注解：1989 年 6 月初，动乱在温州市民中引起挤兑风潮，城市信用社首当其冲。6 月 6 日至 8 日，温州市区 13 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共减少储蓄 1111.4 万元。由于全国各地的交通被阻断，许多个体、私营企业的原材料运不进，产品发不出，资金被拖欠，生产只好停顿。

正是因为对个人财产的关心，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从内心深处迫切希望社会稳定、天下太平。

但对中央平定动乱行为的支持并不能改变温州被质问的地位

第一次调查组向中央提交了《浙江温州实行股份合作企业的情况》《温州市对挂着集体招牌致富的私营企业开始进行明晰产权的试点工作》等三个专题材料，认为温州试验区的改革试点工作要继续下去，该试验的项目还要试，但必须要逐步完善。

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说，国务院批准的改革试验应该继续下去。温州的经济发展有它的特点，温州经济叫不叫模式，我们可以不去管它温州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只要是符合十三大精神，因地制宜，有利生产，利国利民的，就要继续向前走。温州的十年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任何

时候也否定不了。

二下温州

时间：1989 年 10 月。

缘由：1989年 9 月 21 日，一位姓吴的“温州老百姓”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宋平、李瑞环：“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信的最后说，“温州市委领导是好的，多数同志廉洁奉公，工作辛苦，只因潮流如此，无力回天。请中央领导同志派得力要员，把温州重新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过程：这封信由中央信访局转给李瑞环同志。10 月 12 日李瑞环将信的原件摘要呈送李鹏、姚依林。10 月 14 日李鹏批示：请袁木同志组织调查。据此，国务院研究室派黄家全、李小明 10月 22 日到杭州，与时任省委书记的李泽民交谈后，10月 24 日至 11月 1 日，共在温州考察 8 天。涉及 13个部门 8 个县（市、区），36 个厂矿企业事业单位，74位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和个体、私营、集体、国有企业负责人及居民代表，广泛听取意见。

1989年 10 月 26 日晚，中南海第二次调查组召集永嘉、苍南、平阳、乐清、洞头等 6个县的县委书记或县长开座谈会。会议的话题是温州十年改革的路子对不对、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对温州存在的阴暗面怎么看。下面是部分发言的摘要。

屠锡清（乐清县长）：

我是长期搞计划经济的（原为市经委副主任）。我非常希望温州也能像其他城市一样，搞一个宏大的国有和集体工业

布局,国家能给予大力投资。然而,我们等啊等啊,等了几十年等不到什么。国家不给温州投资，怎么办？难道我们不可另想办法?! 有人说我们县是靠假冒骗、偷漏逃、制贩黄货富起来的,这从哪说起 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能接受的。当然乐清的问题也是有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假冒骗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对于假冒骗行为，我们是一经发现,就予以打击。至于‘ 温州的妓女满街走 ”,不确切,没那么严重,我也没看见过。当然,暗娼是有的,但我们是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取缔的。

目前，乐清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普遍存在“ 三忧 ”“ 三愁 ’和‘ 三怕 ”:一忧党的政策变化,愁‘ 枪打出头鸟 ”,怕被戴资本家的帽子；二忧税率加重，愁无利可图，怕被戴偷漏税的帽子；三忧私营企业受歧视，愁业务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难做，怕个体和私营经济得不到保护。这样下去，税源的大头被切断,财政困难,我们书记、县长难当啊！

周方权(苍南县委书记):

我认为温州的做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是改革改出来的,开放放出来的,二是‘ 逼上梁山 ’逼出来的。温州人也希望温州能像苏南那样发展，但是温州人多地少，农业条件差，专靠农业没有办法；温州矿产资源匮乏，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靠国有、集体工业企业不能解决问题；靠国家，国家财力又有限。那怎么办？温州人坐等饿死？

包哲东(洞头县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认真、冷静地分析十年来温州走过的路子和发生的变化，我认为温州别无他途，只能这样走，也应该这样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过去，有人概括说洞头是‘8个书记、8万人口、800万贷款”;下面一个乡共29名村党支部正副书记，其中9名讨不起老婆，女子只嫁出去没娶进来的。近几年，洞头的发展变化可谓大矣。现在洞头人吃的讲营养、穿的讲洋相、住的求气派。不论城镇还是渔村，到处是一栋栋漂亮的楼房，许多渔民房间里摆满高档的家用电器，布置得富丽堂皇。回顾洞头十年间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能说我们的路子不对？

第二次调查组的报告很快出来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的结论是：“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是不成立的。”

三下温州

时间：1991年7月。

缘由：1991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社编发的《每月总汇》刊登了署名温州离休老干部的《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的来信。信中描绘温州老板“骑的本田王(日产高档摩托车)、穿的A底王(ADIDAS系列鞋袜)、睡的弹簧床(香港雅兰床,价值4000元)、抱的花儿王(嫖玩高级暗娼)”。而来自各地的雇工工作、生活境遇很差,没有保障。

过程：一位原国家领导同志看了这份材料后，即作如下批示:建议党中央、国务院派清查团,本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早有所闻的温州市严重丧失革命政权、乱无法纪等诸多问题加以查处,不然将大乱。遵照批示精神,7月4日至15日,国务院研究室沈柏年局长一行4人赶赴温州，就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变化，以及每种经济成分内部的分配状况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第三次调查组在《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考察报告》中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初步解决和缓解了温州长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活跃城乡市场，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发展中带来的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如偷税漏税严重，雇工劳动条件差、强度大，假冒骗问题突出，部分个体、私营企业主追求高消费，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冲击了国有、集体企业职工队伍等等”。由此，也就部分改变了‘温州经济在总体上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的前两次调查结论。

中南海派员三下温州在温州发展史册中抹上了浓重的一笔，画上了始终没有画圆的句号。

温州人把这一页收进了自己的行囊，肩头更沉重，脚步更坚定。无休止的质疑，没完没了的争论。中国还耗得起那么多时间吗？

没有什么经典的理论可以护航。能为自己、为改革开放辩护的，惟有发展的事实，惟有富民强国的真理。

先生娃，后取名

今天的温州人看来，当年一支支调查组开赴温州，是在认真考虑该给温州戴一顶什么帽子：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就在那一特殊日子的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前往温州考察，提出了妙趣横生的‘光头论”。虽然李瑞环



李瑞环：不要怕有人给温州戴“帽子” 光了头更凉快！

同志的原话很多年以后才慢慢见诸报端，但急切的温州人当时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探知了一二。

一位温州的朋友甚至颇为权威地向我们发布新闻：那一年的夏天，剃光头的温州人的确比往年增加了若干倍云云。

1991 年 5 月 14 日 11 时 10 分，一架‘挑战者’号专机徐徐降落在温州机场的跑道上。机舱门打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笑呵呵地急步走下舷梯。随即改乘汽车，驶上简易公路，直接赶往中国第一座农民集资兴建的农民城——苍南县龙港镇及金乡镇。

当晚，温州市区与往日一样，灯火通明，喧嚣繁闹。李瑞环一行步行到环城东路、公园路视察夜市。在一爿小商品摊位前，他环顾了一下摊位上的各类服装、装饰品，突然指着眼皮下的几串珍珠项链，明知故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这些是仿制品，没真的，所以便宜。”摊主几乎不加

思索。

众人大笑。李瑞环同志满意地对摊主竖起大拇指，含笑离去。

在乐清县柳市镇股份合作的求精开关厂，当李瑞环得知这位厂长 5 年前入股 5万元创办企业，现在已增值到 40 万元后,询问道“:去年你分了多少钱 ?”这位厂长报了个保守的数字。

李瑞环一听连连摆手：“那你比存银行还不合算，要不然就是你没讲实情。我想我们在一起研究问题，大家都把真情实况讲出来好不好 ?”

温州市委一位分管股份经济的副秘书长赶忙汇报：每位股东一年可以拿到三笔收入：一是股息，其利率允许比国家银行基准利率高 30% ,而且计入企业成本,在税前开支;二是税后利润有 25%用来分红；三是税后利润的 50%虽用于扩大再生产，但产权记在股东名下，可以由股东支配转让。

李瑞环听罢颔首,转身问厂长“:是这样吗 ?”厂长笑着点点头。

“好,好。”李瑞环这才放心地说。

既然来到温州，就绕不开温州姓什么的老话题。

李瑞环没有回避，开门见山：

“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经成了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私营经济的一种态度。对个体私营什么态度，人家就看你对温州怎么样；对乡镇企业什么态度，就看你对苏南一块怎么个态度；开放这件事究竟是卖国还是吃亏了，或占便宜了，就看你对珠江三角洲怎么看。这谁也没说,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没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温州这件事怎么看，将来怎么看都还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地下结论。我看你怕别人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急着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

为此，他还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好比给小孩起名字，总不能没等生下来，还不知是男是女，就急急忙忙给起名字。叫什么名字并不是最紧要的。要是生个男孩，那就叫‘铁柱’‘石蛋’之类的名字。要是生个女孩，那就起个‘招弟’之类的名字。还有的小孩生下来先起个小名，等长大了读书时再起个大名。

先生娃，后取名。

事实上不仅温州如此，整个中国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要往前走，中华民族要往前走，否则，等待我们的，只能是淘汰出局。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是我们义无反顾地选择改革的初衷。因为任何改革都必然带有无法逾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我们怎么往前走？代价最小的捷径在哪里？会遇到多少妖魔鬼怪？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知道。中国改革前无古人，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故事可讲，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也不能给予我们超越时空的指点。这正是中国改革的艰难所在，也正是中国改革的意义所在。

发展才是硬道理。今天，这句名言已深入人心。但是在一个把名分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国度，确认这一点，是多么地不容易。

温州是幸运的。继李瑞环之后，1991 年 4 月 23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乔石考察温州。同年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考察温州，并充分肯定了温州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

针、政策指引下,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脱贫致富、繁荣市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历史没有辜负温州人的等待。

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去

有几部电影，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不能不提的。它们没有在奥斯卡、戛纳、柏林等电影节上泛起过一丁点的油花，却足以令任何国际级大导演们惊羡不已：它们的观众数以亿人次计，创造了世界电影之最。相比之下，好莱坞的亿万美元票房又算什么。

这几部电影的共同特征：创作、公映于 20 世纪 70 年代前半期；都有极其明确的政治背景和影射功能。

它们的名单:《决裂》《春苗》《战洪图》《海霞》等等。

不为人所知的是，就在这一时期，还有一部差一点隆重推出的同类电影《苍山志》。1974 年,一批来自北京的作家、电影导演被赶到温州永嘉县里湾潭大队“体验生活”，创作出了电影剧本。后因种种缘故，最终没能出笼，搬上银幕。

炮制《苍山志》的背景,是 1966 年至 1975 年,温州永嘉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1973年春，江青亲自批示，把坚持“吃大锅饭”的里湾潭大队树为处在资本主义势力四面包围,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以此来反证“包产到户”的“罪孽”;“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姚文元也从不同角度对永嘉作了批示,并把拥护或反对里湾潭作为在永嘉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惟一标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